

馬寅初事件與反右運動

徐文路*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馬寅初事件時常成為解釋從整風到反右時期，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重要個案。然而根據當時中共主要報刊資料，以及近人的回憶研究，並對照中共政策發展歷程可知，馬寅初事件就其性質與起迄時間，實有別於反右運動，而與大躍進前後中共的政經情勢有關，必須重新理解。此外，既有關於反右運動與馬寅初事件的歷史解釋，也必須重新修正。

關鍵詞：馬寅初 反右運動 新人口論 計劃生育

* 天主教輔仁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一、前言

今年(2007)是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距離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也正好過了半個世紀。1957年中共從整風轉向反右運動，始終是理解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關鍵歷史事件。1979年，在鄧小平「1957年反右派鬥爭沒有錯，……問題在於擴大化」的一錘定音下，反右運動的官方政治解釋也早已定案。¹因此，在稍後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中，便按照了此一調性，確立了反右運動的官方解釋，並對反右運動賦予了「擴大化」的定性：

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²

然而另一方面，許多針對個別「右派」人物的個案研究與大量的「右派」回憶錄在1980年代以後出爐，不但揭露了中共官方當時反右運動的種種實際舉措，同時也形塑出另一套對於反右運動的系統性解釋。以丁抒為例，在《陽謀》一書中，他認為反右運動一如書名，是中共官方所發動的一場有計劃、有步驟的、對知識份子的政治清洗運動，是中共政權專制的例證，同時也是中共愈益走向「左」的開始，其所造成的災難，決非用「擴大化」可以解釋的：

¹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卷，頁288。

²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ch-80years/lici/11/11-6/2.htm>。

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在那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從反右開始，毛澤東政權走上了一條不可逆轉的暴虐、衰敗之路。³

中共官方的詮釋角度以及丁抒的看法，這兩種對於反右運動的不同歷史解釋，大體而言，是目前中文學界研究反右運動，甚至是研究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主要解釋取向。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認為當時整風與「雙百方針」的提出，是毛澤東對於共產黨統治中國以來產生的各種問題，希望找到能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國重演的方法，進而向黨外開門進行整風，整風的目標是中共黨員和幹部本身，而非自始即針對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至於為何整風會轉向反右，則是中共黨內對於整風的不同態度造成高層政治鬥爭的結果。⁴對於這樣的解釋角度而言，不但「陽謀」一說難以成立，連帶的，官方對於反右運動的說法，也必須重新理解。但是，這個解釋角度對於個案並沒有展開分析。

1950年代，著名知識份子馬寅初遭到批判一事，長期以來都是人

³ 丁抒，《陽謀》（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5），頁13。

⁴ 此種看法在西方學者尤多，如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89-249. 作者甚至把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視為毛澤東、劉少奇衝突的一部分，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遠因之一。又如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86), 本書則著重比較中蘇共對於政治異議的處置差別。另可參考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關於從整風到反右轉折的分析，詳見本書〈結束語〉。

們理解 1957 年反右運動期間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重要案例，許多以反右運動為主題的著名紀實性作品，都以此事件例說明反右運動時期知識份子的遭遇。丁抒的《陽謀》、朱正的《1957 年的夏季》莫不如此。

在丁抒看來，反右初期馬寅初由於有毛澤東對於人口問題的支持，因而免遭批判。當其時，馬寅初甚至也是贊成反右運動的。但是過沒多久，在康生的指使之下：

馬寅初就成了全國的批判對象，各種報刊發表的批判文章竟達一百六十多篇。北大校園內在黨委策劃下，共貼出九千多張大字報對馬老加以圍剿，說馬「借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妄圖搞垮社會主義，使資本主義復辟」。⁵

馬寅初為了自我辯駁，在 1959 年 12 月 12 日，他交給《新建設》雜誌社一篇〈重申我的請求〉的文稿：「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如此一來，更是遭受嚴厲的批評。康生宣佈馬寅初「借學術為名，搞右派進攻……他的校長是不能做了。」⁶因此：

北大黨委書記陸平遵命，立即發動全校對馬寅初實行大字報圍攻，並匆匆解除了他的北大校長職務，同時將他定為「內控右派」。

「內控」即「內部控制」。共產黨內部將此人定為右派，但不公開宣佈，除了極少幾個校黨委首腦，人人都被蒙在鼓裡。⁷

朱正則認為，在 1957 年以來的人口問題的批判中，雖然可以看到許多人如陳達、吳超等因為人口問題而受到批判，但是在人口問題

5 丁抒，《陽謀》，頁 463。

6 丁抒，《陽謀》，頁 464。

7 丁抒，《陽謀》，頁 464。

上真正的代表人物是馬寅初。但礙於馬寅初的學術地位和風骨名聲，特別是中共建政初期馬寅初在政治上的合作態度，不能劃為右派。於是只是在批判那些在人口問題上發表過意見的右派分子的時候，不點出姓名地附帶批判一下。1957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報》發表專文〈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點了費孝通、吳景超、陳達、李景漢、陸欽範等右派分子的名，而對於馬寅初則只是用「算賬的還有一位經濟學家，他算的面更寬」來代替。「馬寅初雖沒有劃為右派，也可算受了一次嚴重警告的處分了。」⁸

這二者的說法當中，雖然對於馬寅初在反右運動時是否被劃為右派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卻都不約而同的把馬寅初事件作為反右運動時期的重大個案提出來作為例證。此外，從二者對於事件始末的說明中，看不出實際的批判過程，而只有概括說明。許多相關的人事物，面貌模糊，容易使人對於事發經過產生誤解，包括毛澤東在此一事件當中的角色。

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足以證明毛澤東主導此一批判事件，相反的，毛澤東在此一批判事件前後，都有諸多文件明示要控制人口。把馬寅初與毛澤東的觀點對立起來的做法，是從1950年代當時那些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便已開始，並在近三十年間深入人心。但是明白表示是毛澤東要求批判馬寅初的看法，最早是出於幾位為馬寅初作傳的作家(如鄧加榮)，而後則是賀吉元的一篇刊登在《中國檔案報》上的〈馬寅初與毛澤東的人口問題爭論〉，此後在中國大陸，許多報刊雜誌、網路文章便把「毛澤東打擊馬寅初」、「周恩來企圖從中營救」等這一類看法廣泛傳開。然而這些說法，不論是鄧加榮或賀吉元，並未直接引證史料來源，而只是用敘述的方法一筆帶過。筆

⁸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頁474-475。

者遍查中共官方編輯的《毛澤東文集》、《毛澤東選集》，文革時期流出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文革後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姜義華編《毛澤東著作選》，乃至於近年剛編成的《毛澤東傳》，遍尋不到毛澤東個人表示要打擊馬寅初的隻言片語。換句話說，此一看法並無直接史料可資證明，這與毛澤東公開批判梁漱溟、胡適、《武訓傳》，甚至是批判中共高層領導人、並留下諸多文件的作風顯然大不相同。相反的，筆者反而找到了許多毛澤東強調要控制人口問題的說法。因此，大陸坊間流傳的「錯批一人，多增三億」、「毛澤東指示、康生出手打擊馬寅初」等說法，以目前的資料來看，實難成立。⁹

其次，康生插手對馬寅初的批判，始自 1959 年底，而馬寅初被批判，則早在 1955 年便已開始，1957、1958、1959 三年之間，各有幾波批判馬寅初的高潮，康生充其量不過是最後一波的干預者，在此之前的批判從何而來、何由而發生，丁抒則未加說明。朱正則更為簡略，除了指出 1957 年 10 月《人民日報》其中一篇的批判文章之外，則再也未見更多的說明。

至於各種馬寅初的傳記，則較能明確地記載馬寅初從 1957 年至 1960 年間的各種活動和言行，但是對於各種批判、反對馬寅初的言行，以及馬寅初在整風到反右期間的作為，或許囿於為傳主諱，或是為求政治正確，往往只是做個概略性的統計說明，或列舉當時批判馬寅初的重要語句，也就不再深究。¹⁰然而這些批判的過程、幾波批判

⁹ 不過，中共的資料公布與否，往往有諸多外人不可解的政治考量，因此，本文只能說在正式資料未公布前，歷史研究者實不能道聽途說便信以為真，並不表示毛澤東一定就不反對馬寅初的意見。其次，就當年若干批判文章的內容顯示，由於牽涉到馬寅初的理論是否為馬克思主義，這也就使得毛澤東與馬寅初的意見極有可能存在著一些原則上的區別，但是也決不是在當年許多文藝打手們所認定的問題上，詳後。

¹⁰ 目前已知的馬寅初傳記，記有鄧加榮，《馬寅初傳》（上海：上海文藝出

高潮之間的時間間隔和順序，乃至於各種正反論點，卻正是認識馬寅初事件的重要關鍵。

因此，筆者根據當時的期刊和報紙，並對照近年來的各種有關馬寅初的傳記，細加考察馬寅初事件的起迄時間和經過之後，筆者認為，馬寅初事件之過程頗為複雜，其性質遠非「反右案例」所能解釋。故筆者擬就此一事件之來龍去脈重新進行梳理，希望未來能藉此一主題之觀照，重新思考中共與知識份子之關係。

二、馬寅初事件的歷史事實與解釋

(一)反右運動——性質與分期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的政治傾向，開始了有左右之分。儘管左與右是從當時法國國民會議中的座席來分的，但是當時政治激進者即為反皇室和皇權者，從這個角度而言，左右還有進步和保守或反動之分。十九世紀下半起，左右成為對待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態度，而此一分別，也成為各國共產黨在對待自身內部派別時的一種稱呼。中共的左右區分，在建政之前，基本上是在列寧的基礎上進一步劃分「『左』(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右)傾冒險主義」。¹¹不過，這樣的分類方式到了中共手上，尤其是毛澤東，又在左與「左」之間又劃出了一道界線，以區分「真正的革命派——主客觀相符」(左)與「主觀

版社，1986)；楊建業，《馬寅初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楊勳、徐湯莘、朱正直，《馬寅初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彭華，《馬寅初的最後33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李正宏、黃團元，《民族瑰寶馬寅初》(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¹¹ 中共中央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4卷，頁178-269。

認識超過客觀條件和局勢的判斷」(『左』)，而右則被界定成主觀認識趕不上客觀條件和局勢的判斷。¹²此外，在毛澤東的劃分時，又多出了一個中派，中派時而有兩面派的意思，時而只有夾在左右兩邊的意思。總的說來，毛澤東認為，「左」與右都會傷害中共的革命事業。因此，中共黨史中有許多次的反「左」或反右的政治運動。但是，自從1957年6月，繼1957年3、4月間中共進行開門整風之後的大規模反右運動展開以來，「反右運動」一詞已日漸成為此次政治運動的代名詞，一般在無特定的說明情況下使用此一詞彙，幾已專指此一事件。

那麼，何謂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如上引〈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文，中共官方認為，反右運動是在1957年開始的整風過程中，針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企圖「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所進行的反擊。這是一直以來中共官方對反右運動的解釋，以及政治上的評價。換句話說，1957年4月27日起的整風運動，因為後續的發展，引發了反右運動。¹³論其開始的確切時間，就中共黨內而言，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並下發給黨內，至少在心理上已進行準備。6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則是此一政治運動的開端。至於反右運動何時結束，則難以明確界定。但是有四個時間點值得參考：

1. 195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朱正認為，此一會議是在為反右

¹² 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頁276-318。

¹³ 中共中央於本日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於5月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運動做總結，同時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號，並且基本通過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修正草案，為大躍進揭開序幕。¹⁴

2.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此通知係為了糾正在反右運動中，中共各級黨組織在劃定右派時並無統一標準，因此擬出六條劃定右派的標準、四條劃定極右分子的標準，以及六條不能劃為右派的情況，要求各級組織依此一標準檢查是否錯劃。因此，在10月15日之前，反右運動可能已結束，或者正走向末期。¹⁵

3. 1958年3月16日，約有一萬名在反右鬥爭中過了關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個「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中提出了〈自我改造公約〉，強調「儘早地把自己從資產階級分子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改造成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份子。」此舉明顯是為了大躍進而做，據此，則反右運動在此之前已然結束。¹⁶

4. 根據丁抒的說法，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整風沒有整好的，要補課」，因而有了所謂自1958年下半年「反右補課」的說法，許多人如著名的翻譯作家傅雷，即是在此時被打為右派。若是如此，則成都會議以前，反右運動即已結束。¹⁷

¹⁴ 朱正，《1957年的夏季》，頁594。

¹⁵ 〈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1.htm。

¹⁶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自我改造公約〉，《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3月17日。<http://www.szlib.com:82/renming/search.wct?channelid=5020>。此為蘇州大學圖書館的電子資料庫，故而無從知其版次。以下本文所徵引出自《人民日報》之文章，如無特別註明，則皆出自於此，不再說明。

¹⁷ 丁抒，《陽謀》，頁322-324。不過筆者遍查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三次講話(3月10日、3月20日、3月22日)，並未找到毛澤東關於「反

在整理反右運動的相關性質與時期的資料，並與馬寅初在此一時期的言行相對照後，筆者發現，其中有許多既有的歷史解釋，存在著矛盾與模糊之處。

(二)馬寅初事件——反右運動案例或另有所指？

首先，綜上可知，反右運動始於 1957 年 6 月 8 日，至於結束的日期，大致上而言，1957 年底到 1958 年初，緊接著大躍進，是為可信之推論。如果加上「反右補課」的 1958 年下半年，則最遲也拖不過 1958 年底。可是筆者詳查當時主要批判馬寅初的報章、期刊和專書，以及馬寅初本人關於〈新人口論〉的形成過程，卻發現馬寅初首次因人口問題被批評，始於 1955 年，而直到 1960 年，仍然有人著文批評馬寅初，時間上與反右運動有所重疊，但又比反右運動長。況且，馬寅初在整風到反右時期，就現有的史料來看，同時兼有批評(中共)者、反對批評(中共)者、被(「右派」和中共)批評者等多重身分，絕不是只有被(中共)批評者的角色。

其次，整風時期有許多學者也強調重視人口問題，要求實施計劃生育，如陳達、吳景超、陸欽範等，都在反右運動時期被打成右派，唯獨馬寅初沒有。¹⁸不僅如此，1955 年至 1960 年間，馬寅初並沒有

右補課」的說詞。詳見《毛澤東思想萬歲 1969》(出版項不詳)，頁 159-180。如果丁抒所言「反右補課」的開端有誤，那麼可能另有其因由，而反右補課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這可從許多當事人的回憶看出來，如熊衛民，〈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幹部與科學家——羅登先生訪談錄〉，《中國科技史雜誌》，2005：3(北京)，頁 257-265。

¹⁸ 陳達和吳景超等人後來在一系列批判人口問題的文章中都被點了名，但是他們成為右派的罪名，更可能的是與人口問題相關、又有所區別的「企圖復辟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並因此被拿來跟所謂「章羅同盟」有連繫。詳見新華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結束討論，章漢夫痛駁杜勒斯顛倒是

被剝奪發言權，他的反駁文章仍是公開見諸報端和期刊上，他也參與許多公開的政治、外交活動，同時上報。這樣的待遇，按許滌新的說法，是由於周恩來保護了馬寅初，使得馬寅初未被劃為右派，但是馬寅初仍被定為「內控右派」。¹⁹按照丁抒的說法，馬寅初被定為「內控右派」，是在 1960 年初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的事情。²⁰若馬寅初早在 1957 年即被劃定為「內控右派」，那麼馬寅初在 1957 年下半年以後直到 1960 年之間的各種公開發表的文章，以及各種重要的政治外交場合的出現和工作，不像是一般黨外人士被定為「內控右派」所應有的政治待遇。若丁抒所言馬寅初被劃為「內控右派」的時間為實(即 1960 年)，則更加說明了對馬寅初的批判問題，與反右運動不論在時間上、性質上，都有所不同。²¹

另外還有一些事情值得推敲。首先，在馬寅初獲得平反時，先是 1979 年 7 月 16 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李貴向馬寅初親口坦承，1958 年和 1959 年對馬寅初的批判是錯誤的；²²而後 9 月 11 日，中共黨中

非，章伯鈞羅隆基等右派首腦表示「向人民低頭認罪」，《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7 月 16 日。關於這部分，本文後面還會涉及。

¹⁹ 有些重要的科學家和知識份子不宜公開定為右派者，即定為「內控右派」，只有中共黨內極少數人知情。詳見邵純，〈黃鐘大呂馬寅初〉，《人民日報》(北京)，2002 年 6 月 13 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434/8436/20020613/751974.html>。但是許滌新的說法中，並未說明馬寅初在何時被劃為「內控右派」。關於周恩來保馬寅初一事，應是確有其事，也見彭華，《馬寅初的最後 33 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頁 161。

²⁰ 丁抒，《陽謀》，頁 358。

²¹ 不過，直到 1965 年，馬寅初雖然失去了人大委員的資格，但還保留了政協常務委員的頭銜，詳見新華社，〈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名單〉，《人民日報》(北京)，1965 年 1 月 6 日。

²² 鄧加榮，《馬寅初傳》，頁 285。

央正式批准北京大學黨委〈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也指出1958年對馬寅初先生的點名批判是錯誤的；1959年由康生主導在北京大學進行的全校大批判，並迫使其離校，更是極為錯誤的。那麼，1955年到1957年對馬寅初的若干批判的聲音出現，以及1960年以後的批判，又該如何看待？其次，1979年，馬寅初事件曾經被胡耀邦生動地用一句話來說明：「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馬寅初獲得平反之後，中共的輿論宣傳把馬寅初譽為中國提倡計劃生育的第一人，而「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說法也就廣為流傳，並日漸形成了毛澤東反對馬寅初關於人口控制的看法。這些說法是否恰當？²³

因此，筆者認為，批判馬寅初的人口問題，某種程度而言，與反右運動雖在時間上重疊，但性質上並不屬於反右運動的範圍。尤其1958-1960年是中共處在大躍進的政治高潮中，長期以來大躍進的各種作為中，為人關注的多半是關於中共在生產力的躍進舉措，卻較少專門從生產關係的變革來看，而生產關係的變革是中共當年最為在意的事情之一。而生產關係的變革，是包含了意識型態領域的部分，舉凡各種中外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馬克思主義是否可以穩居上風)、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中共可否領導知識份子)，乃至於各大專院校中要職位的人事安排(校長、系所主任等是否為黨員任職)，都涵蓋在意識型態領域之內。因此，在考察馬寅初事件時，也必須把此一因素納入考慮。

由於上述問題有著許多令人未解的部分，故本文企圖將馬寅初被批判的事件看成是有別於一般反右運動案例來看待，查其蹤跡，尋其

²³ 尤其是賀吉元，〈馬寅初與毛澤東的人口問題爭論〉，《中國檔案報》(北京)，1998年10月15日，第3版。此文一出，許多網路文章以此為本大量轉載改寫，影響甚廣。

始終，以期獲得進一步的理解，得出較為合理的解釋。由於當時對於馬寅初的批判文章和活動，刊出與報導最多的，當屬《光明日報》、《新建設》雜誌和《經濟研究》雜誌等，而《人民日報》為中共中央直屬報紙，所有政治風向的變化與人物的臧否皆具有指標性和代表性，故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將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建設》和《經濟研究》為主軸，輔以當時其他相關的報章雜誌，以及後人的研究和回憶，再現馬寅初事件的來龍去脈。²⁴

三、〈新人口論〉的提出及其遭遇

1953年，中共進行了建政以來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至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一共有6億1,900多萬人。此一數字，距離1947年國民政府所做的全國人口統計數字4億5,500多萬人，多出了約1億4,000多萬人，按照馬寅初的估計，中國人口在這六年之間，每年平均約以20‰的比例成長。²⁵如此的人口增長率引起馬寅初的重視，這是馬寅初決定提出〈新人口論〉觀點的主要初衷。由於這個統計結果，許多學者和黨外人士也紛對人口增長問題提出呼籲，包括前文所提及的陳達、吳景超等人，更包括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

（一）〈新人口論〉提出之前中共對於人口問題的態度

徐熊是資深記者，早年曾經在韓戰當戰地記者，採訪過許多重大事件。他認為就政策上，最早提出人口問題的不是馬寅初，而是中共

²⁴ 與批判馬寅初更為直接的《光明日報》，其間的曲折，詳見鄧加榮，〈馬寅初與《光明日報》的恩恩怨怨〉，《炎黃春秋》，1998：4（北京），頁18-22。不過，這篇文章的描述與賀吉元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影射毛澤東與馬寅初的觀點對立。

²⁵ 馬寅初，《新人口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頁2。

中央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委員長提出，最近毛澤東主席同中央書記處其他幾位同志議了一下，大家一致認為中國需要節制生育，控制人口。那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於現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作為記者，我參加了這次人大常委會會議，目睹了會上發言爭先恐後的熱烈情景。常委們一致擁護中共中央提出的這個節育號召，並且從國家、個人、社會等角度闡明節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應注意的問題，對避孕具體措施也提出不少建議。在會上發言最積極的，要算邵力子和馬寅初。會議開了一整天。可是，由於這是一件大事，需要黨內黨外充分醞釀，所以這次會議沒有公開報導。此後一系列有關「節育」活動，都是公開報導的。²⁶

由於看不到當時的會議記錄，不知實情為何。不過，毛澤東對於人口問題的看法，似有其自身的思想脈絡可循。

毛澤東最早關於人口問題的相關論述，可上溯至1921年。當時由於中國左傾的知識份子正面臨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衝擊，毛澤東在一封給蔡和森的信中表示支持蔡反對無政府主義。毛澤東在申明自己也反對無政府主義的同時，更以人口問題作為反駁無政府主義的理由：

再有一層，是我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懷疑。我的理由卻不僅在無強權無組織的社會狀態之不可能，我只憂一到這種社會狀態實現了之難以終其局。因為這種社會狀態是定要造成人類死亡率減

²⁶ 徐熊，〈是馬寅初最早提出「計劃生育」的嗎？〉，《團結報》（北京），1994年8月20日，第4版。當時中共中央常委會開會非常頻繁，一屆都有上百次的會要開。若按照劉少奇年譜的推斷，徐熊所說的這次會議應是前三次會議。詳見〈劉少奇同志生平年譜〉，《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11/20/content_1190174_1.htm。

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結局必至於人滿為患。²⁷

從上文可知，當時的毛澤東認為，無政府主義將導致人口毫無節制的生長，而人口無節制的成長是不好的。

1930 至 1940 年代，毛澤東對於人口問題未見再有明確的表示。至於中共建政前後，毛澤東關於人口問題的看法，極少見諸文字，唯一比較相關的，主要是在 1949 年一系列批判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及〈中美關係白皮書〉的論述之中。當時，毛澤東認為，艾奇遜把國民政府為何會遭遇到中共革命的強力挑戰，歸結為中國近代以來過多的人口和過少的耕地所致。對此毛澤東則反駁，他以美國和俄國為例，證明革命不是因為「人多地少，糧食緊張」所造成，中國的革命「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人口過剩」：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美國 1794 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²⁸

²⁷ 毛澤東，〈致蔡和森等〉，收錄於姜義華編，《毛澤東著作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34。

²⁸ 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收錄於《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

在提出經驗反證之後，毛澤東認為，只要解決了壓迫和剝削，吃飯問題就可以透過發展生產來解決。²⁹此一論點不但反映出毛澤東對於人口問題與民變、革命之間的關係並無直接關連的看法，同時也顯示出毛澤東認為政治革命將會對中國社會貧弱的時況帶來有效的改變。

人口數量的消長和糧食之間的關係，甚至引伸到前現代的國家與社會的政治穩定與否(即民變和革命的起因)，一直以來存在著爭論。乾嘉時期的洪亮吉，以及比其稍晚的汪士鐸，都認為中國的人口過多，以至於貧困農民人數始終無法減少。他們甚至把太平天國的起因也看成是過剩人口所造成的動亂，即把世亂之起因，歸結為人口本身繁衍過速過多，造成糧食緊張所致，而非貧富不均或是官逼民反所致。³⁰此二人的看法與馬爾薩斯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不謀而合，尤其是關於農民貧困與暴動的原因，與傳統的「土地兼併」、「官逼民反」等人謀因素不同，而更加強調了自然力的作用，如此一來，貧窮或社會不公的問題不是以革命手段可以解決的，而是窮人生殖太多太快、糧食增長不及所致，因而洪、汪二人常被大陸學界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³¹正因如此，使得從事革命運動的人士通常對於這一類的看法持否定態度，唯恐革命的主張和行動被視為「造反無理」。從上述毛澤東這兩個說法顯示，他對於人口控制是贊成的，但是他又反對把中國歷朝的

版社，1990)，第4卷，頁1447。

²⁹ 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頁1448。

³⁰ 汪氏關於人口問題的看法，詳見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乙丙日記》(3卷)(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

³¹ 如陳嘉珉，〈中國的「馬爾薩斯」——汪士鐸〉，《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總第4期(香港，2002)，<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3065.htm>；王新華，〈洪亮吉，中國的馬爾薩斯〉，《經濟師》，9(北京，2001)，頁251-252。洪氏之說，論時間而言，比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初版還早五年。類此之觀點，還包括了清末的龔自珍、湯鵬等人。

戰亂、民變乃至於中共政權產生的原因歸結為人口過剩所致。

中共建政之後，1954年可說是中共人口政策實施的關鍵年份。從現有的資料顯示，中國各地開始設置計劃生育的機構，或者開始組織關於計劃生育的工作小組，最早都在1954年。根據中國各省各地計劃生育和避孕措施的實施日期，可以發現，上海、北京、浙江等地是從1954年開始在醫院和衛生部進行計劃生育的推廣工作，其他各地除了少數人口稀少地區之外，也大都是在1955、1956、1957等年分開始的。³²若是把各省節育部門設立的時間與徐熊的說法相對照，至少可以肯定，中共高層在1954年，的確在人口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至少是暫時的共識。這個時期也比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的正式公開發表時間(1957年3月)，早了三年左右，比馬寅初1955年首次在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浙江小組的會議上提出的時間，也早了一年左右。

為什麼說是暫時性的共識呢？因為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在蘇聯當時對於中共的深刻影響下，人口問題的思考不是根據中國內部的具體情況，而是根據蘇聯的理論根據：

(19)50年代中國全盤接受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理論。在蘇聯的理論體系中，有對社會主義人口規律的明確表述：「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表現為人口不斷迅速增加，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得到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合理而充分的利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口法則創造著人口無限增殖和發展的可能性，從而也創造著社會發展的無限的可能性，因為人口無論怎樣增殖，增添出來的人口無論怎樣多，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增長著的生產中是永遠可以為自己找到工作崗位的。」(波波夫)³³

³² 關於各省計劃生育工作沿革的說明，詳見《中國人口資訊網》，<http://www.cpirc.org.cn/index.asp>。

³³ 翟振武，〈現場發言〉，「紀念馬寅初《新人口論》發表50周年暨誕辰

如此一來，類似這樣的說法和結論，就成爲了研究中國人口問題時的教條主義原則。另一方面，仍有若干面對中國實際人口情況的中國大陸學者和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並不這樣想，他們認爲中國人口的成長過快過多，與蘇聯的情況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將影響到中國的工業化速度。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

不過，徐熊的這種說法必須修正。在中共決策圈內，或許真如他所言，毛澤東是第一個提出要把控制人口的問題形成政策的人，但是早在毛澤東提出之前，若干民主人士就已經提出要節制生育的政策，其中最爲著名的就是邵力子。毛澤東 1921 年的那封信所顯示的，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想法，而未將其作爲主題公開宣傳。可是 1921 年，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時任《民國日報》主編，就已積極提倡節制生育。

其實清末民初之際，嚴復等人對於西方思潮的譯介，逐步將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傳引至中國之後，就日漸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人口問題的重視。³⁴陳長蘅、孫本文、陳達、許仕廉等人在 1920 至 1930 年代，教授或宣揚人口問題，並多以馬爾薩斯理論爲藍本，同時也先後提出了人爲控制人口的辦法。³⁵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馬寅初早年對於人口問題並沒有太大的關注。他學成歸國的時間在 1915 年，到北

125 周年座談會」，http://www.chinapop.gov.cn/myc/t20070703_151702281.html。

³⁴ 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臺北：南天書局，1998），頁 403。嚴復當時翻譯馬爾薩斯爲「馬爾達」。

³⁵ 詳見陳長蘅，《中國人口論》（上海：上海書店，1992[1918]）；孫本文，《社會學大綱》（上海：上海書店，1992[1932]）；陳達，《中國人口問題》（上海：上海書店，1989[1934]）；許仕廉，《中國人口論》（上海：上海書店，1991[1930]）。其中陳達在 1926 年於清華大學開設人口問題課程，又辦報刊宣講人口問題，並邀請過美國的計劃生育倡導者山額夫人(Margaret Sanger)到中國。

京大學任教時是 1916 年，自 1916 至 1930 年間，馬寅初的文稿、演講等，大多集中在當時中國的國家財稅制度及工商發展等問題，僅在 1920 年 7 月時於《新青年》發表一篇〈計算人口的數學〉一文，談到了如何計算一國的人口。這篇文章的立論基礎明顯來自於馬爾薩斯，因為馬寅初認為：

人口的增加，是好比數學上的複利息。複利息是要利上加利的 (interest produced interest)，人口增加也應該如同複利息一樣，不應該像那單利息一成不變的。……上面所說的計算方法，從表面上看起來是絲毫不錯的；但是從實際上去說，卻是有點錯誤，因為每年人口的增加是不能一律的，隨時有變更的，故計算的數目是不能盡信的。若是要信任計算的數字，不能不用他種方法去校正(check)。³⁶

此一計算方法，即是根據馬爾薩斯「人口係以幾何級數成長」為基礎的。其實這樣的計算方法，可以說是在人口統計尚未健全的時代，一國欲推估自身人口增長的常用方法，差別則在於各國增長的比例問題。無論如何，人口問題對當時的馬寅初而言，就算心中有所定見，卻是極少表示意見的，他當時的主要心力，還是放在中國財政自主的問題上。相對的，邵力子在《國民日報》副刊上全文發表了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婚姻律〉，把節制生育與婦女解放問題結合在一起宣傳。1922 年 5 月，在向警予主編的《婦女評論》上，他又發表了題為〈生育節制釋疑〉一文，提出要加强節育技術的研究，「盡可用科學的功夫去發明」。³⁷因此，邵力子對於計劃生育的重視，早在中共建

36 馬寅初，〈計算人口的數學〉，《馬寅初全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 1 卷，頁 304-306。

37 吳躍農，〈邵力子與「新人口論」〉，《文匯報》(上海)，2004 年 10 月 19 日，第 5 版。李德全即馮玉祥之妻，時任中共衛生部長，直到 1960 年代。

政時期即抱持此一看法，並且已經付諸宣導和實施。

中共建政之後，邵力子不但直接向中共中央建議，而且還組織民間力量推廣節育的主張，邵力子的夫人傅學文，即擔任了「中華婦女節制生育會北京分會」的會長。1950年初，邵力子就已向當時的衛生部長李德全談過，他對「光榮媽媽」這一類來自蘇聯、鼓勵戰後增生的口號產生憂慮。戰爭需要大量生產人口，但經濟建設卻會因為人口的超速發展而不勝負擔，因而他明確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張。1953年冬天召開的中共政務院會議上，他提出了計劃生育的觀點，這是第一次在中共政治決策場合提出計劃生育問題。他強調「避孕要求不要限制，醫生對生育已多的婦女應同意施行避孕手術。」³⁸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再次發言：

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難很多的環境裏，似乎也應有些限度。……在我國墮胎問題可以撇開不談，至於有關避孕的醫學理論等措施，確是應當傳播的。並且應當從實際上指導並提供有關避孕的方法和物品。³⁹

其實不只是邵力子，包括陳達、吳景超等，都在中共建政之後再度提倡節育。然而種種跡象顯示，不論是當時邵力子找李德全談話，或者是1954年中共高層取得了對節制生育的共識，在政策執行上似乎成效不彰，原因很可能是執行單位對此不甚重視。1955年2月，〈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的批示〉中透露了當時中共衛生部的黨組對於計劃生育的態度：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同意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現將這個報

³⁸ 吳躍農，〈邵力子與「新人口論」〉。

³⁹ 邵力子，〈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人民日報》(北京)，1954年9月18日。

告發給你們。(以下從略)

1955年3月1日

主席並中央：

1954年12月27日由劉少奇同志主持進行了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座談以後，各有關單位均在黨組會、黨組擴大會或部務會議上進行了傳達……1953年1月12日(衛生部)曾通知海關：「查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應禁止進口」。1953年8月以後，鄧小平副總理一再指示我們改正，但我們重視不夠，檢查不嚴，結果延至1954年7月20日始將經政務院批准的修訂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以衛生部名義下達。上述錯誤的產生，是由於我們中央衛生部領導上對節育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盲目地不贊成節育。對這樣的重大政策性問題，我們既未認真研究，亦未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和請示方針，就自作主張，這是忽視黨的領導，是嚴重的分散主義的錯誤，今後應引以為戒。⁴⁰

從這份文件看來，邵力子對衛生部的勸說，並未發揮效果，甚至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提出批評之後還是無動於衷，而一直要到中共高層領導人責令檢討之後才開始認真實行，甚至在報告中還具體談到要設法準備一千萬人份的各種避孕用品，包括油膏、保險套、套環等。⁴¹這個問題顯示，當時中共的國家機構中，至少在部會層級上，對節育問題的態度，即使不是反對，至少也是不重視的。至於農村地區，受到傳統觀念的侷限，反對的聲浪就更大了。這也就是本文稍早為何強調「中共高層在1954年，的確在人口問題上取得了一定

40 〈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的批示」〉，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9/content_2391355.htm。

41 〈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的批示〉。
油膏可能是某種殺精劑。

的、至少是暫時的共識」的原因。意即，即便 1954 年時，中共內部對於節制生育的問題，仍是有許多的反對聲浪。

(二)馬寅初首次提出人口問題

1955 年，受到邵力子的鼓勵，馬寅初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浙江小組提出了與後來〈新人口論〉觀點一致的報告，即〈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這是馬寅初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出中國的人口增長問題。然而這個報告在浙江小組的會議上就遭到其他代表的批評。⁴²

宋雲彬是中共建政初期文化、出版界的著名文人，當年擔任中共人大第一屆二次會議浙江代表團小組副組長，曾帶頭批判馬寅初在小組會上關於人口問題的發言。他曾在他的日記中對此一過程留下寶貴記錄，並指出 1955 年 7 月 12、13、15、19 日的小組會議上，馬寅初的論點遭到各方人士的批駁：

(1955 年)7 月 12 日

下午，浙江小組討論五年計劃，邵力子、馬寅初強調中國人口過剩，余起而駁之。

7 月 13 日

上下午均赴趙登禹路政協全國委員會出席浙江小組，討論五年計劃。馬寅初、邵力子等大談人口問題，實則不滿意五年計劃，以為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失業失學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人口增長過速，而又謂馬爾薩斯人口論極端反動。余兩次起立發言，問此種論點與馬爾薩斯有何不同之

⁴² 馬寅初，〈關於「新人口論」的說明〉，收錄於《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北京：財政出版社，1958)，頁 22。另可參考李正宏、黃團元，《民族瑰寶馬寅初》(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 133-134。

處，則皆啞然無言。馬寅初面紅耳赤，謂余不能企圖阻止他在大會發言(此公準備在大會發言中談人口問題)。

7月15日

上午浙江小組討論五年計劃，仍由余主持。陸士嘉、張琴秋等均對人口問題有所發揮，惜邵、馬二君不肯傾聽也……馬寅初將發言稿清樣送請王國松看，其內容謂目前興修水利、開荒等等皆非根本辦法，根本辦法在限制人口，滿紙荒唐言，不僅貽笑大方，且將為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據為口實。沙文漢看後，大為驚詫，與王國松商議，由王找竺可楨談，請向馬勸告。晚飯後，王赴竺公館，又赴馬公館，歸來已十一時矣。

7月19日

上下午均分組討論，繼續討論五年計劃，邵力子、馬寅初等又大談人口問題，爭吵甚烈。⁴³

1955年第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馬寅初就和邵力子極力陳說中國人口問題，但當時在浙江的小組會議進行當中，遭到上述人等的反對與批評。陸士嘉，著名流體力學專家，1951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兼任教授；張琴秋，中共第一代唯一女性將領，曾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王國松，電工專家，浙江大學副校長；沙文漢，浙江省省長兼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反右運動時被劃為右派；竺可楨，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這些人大多都是知識份子，多數也兼任黨政要職。同時，從他們對馬寅初的批評言詞中，已將馬寅初的看法斥為「與馬爾薩斯有何不同」、「將為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據

⁴³ 宋雲彬，《冷眼紅塵——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西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322-323。

爲口實」。⁴⁴馬寅初當即收回稿件，一方面充實自己的論點，一方面伺機再提。然而早在同年 3 月，中共中央便已發出〈關於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從這個情況可以看到，儘管邵、馬二人大力呼籲要控制人口，儘管中共中央已提出要逐步控制人口增長，但是在許多知識份子和中共各層級的黨政幹部之間，對於人口問題仍有所保留。從中共衛生部和宋雲彬等人這兩個例子裡可以看出，不論是中共黨內，還是民主人士，反對控制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觀點，是有廣大支持者的。這也可以照見 1950 年代中國社會對於人口問題看法的動向：不論是中共黨內或黨外，反對者很可能是居多數的。⁴⁵馬寅初的提案雖然因此受挫，他卻在回北京大學之後，向北大學生公開演講。⁴⁶

(三) 整風前夕再次提出

1956 年，先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的〈1956 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同年 10 月 12 日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的談話中，毛澤東又再一次強調中共實施計劃生育的必要：

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

⁴⁴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由於馬克思早年對馬爾薩斯的理論批判，以及二十世紀初期歐美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潮影響下，當時在中國革命派眼中，曾成為帝國主義殖民藉口的代名詞，孫中山、李大釗等人皆批評過，馬寅初也一再強調馬爾薩斯理論的反動性。也正是如此，宋雲彬等人才會認為邵、馬二人的說法「將為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據為口實」。

⁴⁵ 不過，「反對馬爾薩斯理論」和「反對節育」是兩種不同層次、不同偏重點的事情，這很多當時的批判文章中也有顯示出來，詳後。

⁴⁶ 演講的題目是「關於人口問題和科學研究」，詳見李正宏、黃園元，《民族瑰寶馬寅初》，頁 136。馬寅初自 1950 年起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直到 1960 年。

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畫，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畫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畫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淨增 1200 萬到 1500 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畫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畫的狀態中。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畫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們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節育。⁴⁷

從上述資料顯示，一方面，計劃生育工作成爲中共推動農業發展的工作項目之一，比起之前只在城市中推廣更進一步；另一方面，毛澤東對人口問題的看法，大體仍沿襲他年輕時的觀點：人口生育要有計畫，不能放任。

同年稍後，中共總理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建議〉也指出，必須在二五期間「繼續發展衛生醫療事業，進一步開展體育運動，並且適當地提倡節制生育。」⁴⁸加上同年「雙百方針」的提出，以及隨後 1957 年的整風運動，人口問題獲得社會各界更多的討論空間。1957 年 2、3 月間，《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和《健康報》，都以社論的形式宣傳計劃生育。⁴⁹此外，2 月 15 日，位於北京的中共中央勞動幹部學校舉行人口研究問題的座談會，由副校長陳達主持，與會學者四十多人，發言者有吳景超、戴世光、費孝通、何啓拔、張之毅、趙承信、吳文藻、李景漢、潘光旦、白健

47 紀曉華，〈毛澤東與計劃生育〉，《黨的文獻》，2001：1（北京），頁 59-60。

48 詳見周恩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建議〉，《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9/content_2392046.htm。

49 〈大力推行節育工作〉，《健康報》（北京），1957 年 2 月 19 日，第 3 版；〈積極加強節育的宣傳和指導〉，《中國青年報》（北京），1957 年 2 月 23 日，第 2 版；〈應該適當地節制生育〉，《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3 月 5 日；〈正確地看待節育問題〉，《健康報》（北京），1957 年 3 月 22 日，第 1 版。

華、雷潔瓊、嚴景耀、遊補鈞、陳慶芳等十四人。會議的重心在於：
如何適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掌握人口規律，制定
人口政策，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口理論，並與新舊馬爾薩
斯反動論點作鬥爭，是當前人口研究中的重要課題。⁵⁰

因此，1957年初，贊成注意人口問題與實施計劃生育的討論漸次展開。在這些大背景之下，馬寅初先在3月2日中共同務院最高國務會議上大談人口問題。3月31日，又在公開場合演講中國的人口問題。4月27日，馬寅初還接受《文匯報》的專訪。⁵¹從這裡可以看出，整風前夕馬寅初再次提出人口問題，並不是孤身奮戰的，而是有許多大環境支持的。甚至只從1950年代的各種表現來看，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強調要控制人口，絕對不是首倡者，而是跟隨者。不過，在他提出之後，不但在中共黨政高層獲得充分支持和政策依據，社會氣氛也把人口問題的討論打開了。而毛澤東在1957年3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時也表了態。當時中途有人試圖打斷馬寅初的發言，被毛澤東制止。在馬寅初報告之後，毛澤東又表示：

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完全可以進行研究和試驗。這一條馬老講得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鄉人民均有此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⁵²

50 〈首都學者專家座談怎樣開展人口研究〉，《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2月21日。

51 李正宏、黃園元，《民族瑰寶馬寅初》，頁137-139。

52 楊建業，《馬寅初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頁166。本書作者是《人民日報》記者，既是文革後第一位採訪馬寅初的記者，又是第一位為馬寅初立傳的作家。至今為止，有許多私人回憶或文章道出個別的中共高層人士如何支持和保護馬寅初，卻沒有任何直接的陳述或證據可以指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人口問題終於首次在中共高層決策會議，成為討論的項目。如此一來，報章雜誌上討論人口問題、贊成節育或控制人口的看法，日益冒了出來。1957年5月，陳達和吳景超在《新建設》雜誌上分別發表了〈節育、晚婚與新中國人口問題〉和〈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強調要節制人口，並提出各種可能的辦法，同時不能用強迫的方式進行。《光明日報》在5月7日也轉載了這兩篇文章的要點。⁵³6月3日，衛生部長李德全在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座談會上表示，鼓勵大家用避孕措施減少生育，而不鼓勵人工流產，因為人工流產技術仍不發達，風險高。⁵⁴

在這樣的政治社會氛圍之下，便有人開始思考如何明確區隔社會主義的計劃生育政策，其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而非馬爾薩斯主義的理論問題。1957年4月，《經濟研究》雜誌便刊出了張培剛等人的看法：

我們主張適當地節制生育，這同馬爾薩斯主義根本不同。……馬爾薩斯和他的追隨者慣於用人口和生活資料(有的選用人口和土地面積或人口可耕地面積)相比，以人口為分母，以生活資料為分子，用這個比例的大小來測度社會生活的豐吝。我們認為，問題不在於可以不可以比，而在於如何正確地比，更重要的是不能孤立地或僅從表面來觀察和分析這個比例。馬爾薩斯和他的追隨者，採用了形而上學的分析方法，首先不考慮社會生產關係的根本決定作用，其次在生活資料的增長方面忽視了社會經

出，中共最高層領導人當中，到底是誰對於計劃生育等問題持反對態度。目前唯一可能的人還是劉少奇，詳後。

⁵³ 炳然，〈學術動態——「節育、晚婚與新中國人口問題」〉，《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5月7日，第2版。

⁵⁴ 〈李德全部長說，衛生部並不鼓勵人工流產，最好是強調避孕，不要嫌麻煩〉，《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6月4日，第1版。

濟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因而得出了生活資料的增長速度永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的錯誤結論，並發出別有用心的所謂「人口過剩」和「人口壓力」的叫喊聲。當然，馬爾薩斯主義者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目的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我們的立場根本與馬爾薩斯主義者相對立，可是，如果我們也採用了形而上學的分析方法，那就難免不重新墮入這種錯誤的結論了。⁵⁵

張培剛是 1941 年考取清華庚款的留美公費生，1945 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以英文寫就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 1946-1947 年度哈佛大學經濟學專業最佳論文獎和威爾士獎金，被列為《哈佛經濟學叢書》第 85 卷，1949 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國際上第一本從歷史和理論上系統探討農業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著作，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當時他身在中共社科院經濟研究室。這篇文章在批評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之後，張培剛等人基於蘇聯人口發展情況的經驗材料和人口統計推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口規律是，建政初期由於革命與戰爭的因素，人口數大量下滑，必須政策鼓勵提高。日後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人口增長率必然將會走向穩步增長，而不會一直都是以當前這種高度增長率增長的。不過，從中國大陸本身的經驗顯示，雖然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會發

⁵⁵ 張培剛、毛鋼、胡俊傑，〈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與中國人口問題〉，《經濟研究》（光碟版），1957：4（北京）。《經濟研究》雜誌於 1955 年創辦，在中共的設計之下，它是一個綜合經濟理論刊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當時的主要負責人為陳翰笙。為了在理論上解決節制生的政策與馬克思主義、馬爾薩斯主義之間的關係，以這個雜誌為中心，開始了此一議題的討論，日後卻也發展成了批判馬寅初的重點刊物。本文對於《經濟研究》雜誌文章的引用，係引自利華軟件集團數據中心，「《經濟研究》數據光盤 1955-2000」（北京：經濟研究雜誌社，2000）。因此，無得知各篇文章之頁數。

生像馬爾薩斯那樣的人口問題，但是，「消滅私有財產制度，只能消滅由私有財產制度所引起的人口問題(雖然這是私有制社會最本質最突出的問題)，而不是消滅人口問題一般」，因此，「爲了適應人民的要求，爲了增進人民的健康以維護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應該適當地節制生育。」

儘管本篇文章沒有點名批評任何人，但是本文已提出了若干最爲後人注意的論點，如「人手論」：

從積累和人口的關係來說，我們不能只看到積累和人口作爲消費者的關係一面，而忽視了積累和人口作爲生產者的關係一面。如果我們只把人口看作是消費者，那麼，人口的增加必然意味著較多的消費，較少的積累；這就會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影響每個勞動者所攤得的技術裝備，也就是說，影響活勞動同物化勞動的適當比例關係。但是，如果我們同時把人口看作是生產者，那麼，情況就有所不同。這裏也有幾種情況：一種是增加的人口所創造的勞動，只夠自己消費，沒有爲社會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不增加積累；再一種是增加的人口所創造的勞動，除了爲自己的產品外，還有爲社會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增加一定數量的積累；還有一種情況，是增加的人口所創造的勞動還不夠自己的消費，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減少一定數量的積累。實際上，這三種情況都會發生，但就整個社會來說，特別是就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第二種情況是主要的。

所謂的「人手論」，是 1957 年以後中共報刊所常用的一個用詞，意即強調人不只是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者的說法。由於當時許多強調注意人口問題、主張節育的說法當中，常常強調人口過多將使好不容易增產的物資消費殆盡，因而被批評者們視爲「沒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

更多積累得更多。」⁵⁶

至於馬寅初，此一期間對人口問題並未再有進一步的表示，他在全國人民大會書面提出的〈新人口論〉一文，要到7月間才見報。因此，在整風和反右最爲關鍵的轉折期，即1957年3至6月間，馬寅初並沒有對人口問題表示任何公開意見，倒是對於整風期間對中共各種問題的批評聲浪，採取了特別的態度。

(四) 整風與反右時期的馬寅初

整風與反右時期的馬寅初，其政治社會角色是介乎中共統治高層與普通知識份子之間的。無黨無派的身分，與抗戰、國共內戰時期的民主風骨和名聲，使得他在中共建政初期，即擔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陳雲)，同時又將他從浙江大學校長調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官方任命)。這樣的政治社會角色，加上他自身的性格，整風與反右時期的馬寅初，既是批評(中共)者，又是反對批評(中共)者和被(「右派」)批評者等多重身分。

1957年5月6日、7日和9日，北京大學校園內也開起了整風會，主要是讓師生針對學校領導工作提意見。⁵⁷馬寅初作爲校長，也聽取並接受各方對北大領導工作的批評意見。學者們的批評意見，集中在黨(幹)群關係、學術自由，包括對蘇聯體制和專家的盲目崇拜等方面。5月14、15日，馬寅初則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會議中，呼籲民主人士也要拆牆，不能只要求共產黨拆牆：「目前有些批評是不夠實事求是的，有否定一切的現象。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能光講壞處，好處一點也不講。」對於許多人批評的大學黨委制，馬寅初更直接表

⁵⁶ 此語出自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詳後。

⁵⁷ 〈整風的先聲——記北大召開的黨內外主要幹部會議〉，《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5月10日。

態，採取支援態度：

如果黨委退出去，我是無法瞭解的(按：指北大學生的身家背景和思想狀況)，叫我做校長，我也管不了。……單純批判黨委制不好是不對的，黨委制好的地方要表揚。牆必須從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兩方面來拆，共產黨整風是拆牆，民主黨派也要拆牆，單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⁵⁸

對於馬寅初的說法，民革中常委陳銘樞則反駁，自延安整風起，歷來中共整風都是只講缺點的，越能修正缺點，才越能糾正錯誤。鍋爐專家金芝軒，在中共第一機部任職司長，要求馬寅初，應該更加讓高級幹部、正部長們先接受批評，因為中共中央信任他們，而下級以往又不敢批評他們。⁵⁹

另一方面，馬寅初也不是對中共在學術和政治方面的舉措全然同意。他認為，過多的政治活動和會議影響了正常作息：

好多學者都提出，現在各方面都要拉科學家去開會，每個單位都認為自己只請了一次，各單位加起來次數就多了。為了應付這種難受的局面，經濟學家馬寅初說，他就想了一個請假外出的辦法，去年他到杭州去躲了三個月。可是這總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⁶⁰

⁵⁸ 鄧加榮，《馬寅初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頁 259-260。同樣的事情和發言內容，《光明日報》也曾報導，但有若干字句不太相同。詳見〈無黨派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 批評「三大主義」和「四大偏差」〉，《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5月16日，第1版。

⁵⁹ 〈各民主黨派七次座談三十六人發言，對全國整風運動起了推動作用。座談會將休會幾天，把大家所談問題排隊以後繼續開會〉，《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5月17日。陳、金二人在反右時皆被劃為右派。

⁶⁰ 〈社會科學家們要求些什麼？——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會議旁聽記〉，《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5月26日。

此外，馬寅初對於中共建政以來的若干舉措和態度，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歸納起來有五點，其中對於中共有批評也有肯定：

馬寅初說，……通過這次整風，「黨加強了，民主黨派也提高了」。第二，……要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第三，他認為共產黨在發展組織方面，特別是在發展知識份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這些人多半沒有經過多年的革命鍛煉，也缺乏同自然作鬥爭的知識，他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非黨知識份子感到不服氣，既影響了黨的威信，又造成了黨和非黨的隔膜。第四、關於有職無權的問題。……很多事情都是從上往下貫徹，往下交任務。……應該放心地讓舊知識份子參加管理工作。第五、關於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還是「冒進」的問題。他認為從 1956 年以來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張奚若先生說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說的它的表現。這是把毛主席所說的「穩步前進」忘了的結果。⁶¹

此外，1957 年 6 月 15 日，《人民日報》還刊出了馬寅初批評儲安平「黨天下」的看法：

儲安平先生的話據我看來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決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發表了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以後，我當時看出有些人臉上露出不愉快的情緒，今天儲安平所說的就是代表這一些人的意見。……

⁶¹ 〈在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討論逐步轉向深刻化〉，《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5 月 23 日。

毛主席、周總理決不會有「黨天下」的想法，否則何必有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常委很活躍，其程度超過人大常委，什麼要事都經過公開協商，徵求各方面意見，集思廣益。在憲法條文中皆不見有關於黨與政協的字句，而都見之於憲法序言中，這就是表示黨與政協長期共存的意義，也可從這裏看出沒有「黨天下」的意圖。⁶²

在這次的發言當中，馬寅初還批評了寫匿名恐嚇信給國務院秘書長助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盧郁文的人，表示有話應該直接說，不應該用手段。⁶³

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出現，政治氣氛轉向反右。7月3日，中共一屆人大第四次會議召開，會中的主題除了聽取並通過周恩來及各部會的工作報告之外，批評章伯鈞、羅隆基也成為會議重點；7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馬寅初在這次會議中的書面意見，即〈新人口論〉。⁶⁴這是馬寅初在反右運動開始後，第一次公開提出他對於人口問題的看法，也就是後來人們最為熟知的〈新人口論〉。因此，如果反右運動當中，馬寅初或人口問題是重點打擊對象，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為何會在反右運動正式開始的一個多月之後、

⁶² 馬寅初，〈我對儲安平葛珮琦等的言論發表些意見〉，《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6月15日。

⁶³ 這件事即為日後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的突破口。

⁶⁴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大會和分組討論，各地代表追擊章羅聯盟〉，《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7月4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新人口論」馬寅初的書面發言〉，《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7月5日。前一天即7月4日，《光明日報》則已有要點刊載。詳見〈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7月4日，第4版。

「章羅聯盟」已被公開批判之後，還敢在正式會議中提出？⁶⁵

從這些資料可以證明，在整風期間，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馬寅初也曾受到其他知識份子的批評；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馬寅初既要求非共人士也要拆牆，另一方面也對中共的若干做法提出批評。其次，整風期間，馬寅初的發言並未集中在人口問題，相反的，在整風期間馬寅初對於人口問題的言論著墨反而較少，更多的是針對中共的政、學舉措提出各種正反意見。所以，長期以來認為馬寅初因為在整風期間批評中共的人口問題，因而在反右時遭到批判，實為不確實的印象。

(五) 人口問題的獨立化與政治化

馬寅初在中共全國人大會議所發表的〈新人口論〉一文，主要觀點如下：

1. 現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階級矛盾已經不是主要的矛盾，人口多，資金少卻是一個新的矛盾。過去的矛盾是階級矛盾，現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產矛盾。
2. 1953 年的人口普查，中國人口是六億餘人，年增率是 20%，經過我實地在浙江的訪問調查以及理論推估，這個數字有低估之嫌，實際年增率可能大大超過 20%。
3. 人口增殖的原因：經濟改善，結婚增加；福利照顧，幼托制度；醫療進步，老人死亡率下降；內戰消滅，盜匪絕跡；僧尼還俗，娼妓絕跡；舊思想殘餘，無後為大；獎勵生產，經濟補助。
4. 要改善人民生活，就要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為此就要增加積

⁶⁵ 《人民日報》首次批判「章羅聯盟」，是 1957 年 7 月 1 日，相關分析詳見朱正，《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頁 216。「章羅聯盟」後又升級成為「章羅同盟」。

累，因而要增加國民收入。1956年國民的消費 / 積累比例是 79 / 21，積累不夠。

5. 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錯誤：「級數增長說」不適用於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歐洲，因為糧食增長在科學投入之後加快了。而且馬爾薩斯透過人口論的研究企圖論證工人的貧窮是由於自己的增生所造成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這種觀點，貧窮的真正原因，是社會因素，不是自然因素，是地主剝奪了農民辛苦的成果所致(生產關係)。現在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又跟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更與馬爾薩斯的時代不同。我們現在的缺點不是生產關係不好，而是勞動生產率太低，因此要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6. 我的人口論不同於馬爾薩斯理論，以中國實際情況而言，要增產糧食，就要先有現代化倉儲。這些設備的資金從何而來？原料(鋼鐵、水泥、木材)又從何而來？由於現代化生產所造成的人力節省(約可省下95%)，這些人國家又要花費工資照顧，如果每年又多生 1,300 萬人(以年增率 20‰計)，問題就非常嚴重。

7. 中國現在搞許多中小型工業，為的就是多安插人，但社會主義就該要多搞大工業，過多人口拖住了高速工業化的腳步。農業方面，生產率低，要改善生產力，到頭來還是只有機械化。一樣，資金和原料哪裏來？

8. 因此，可否把提高積累比例？蘇聯是 75 / 25，但中國國情不同，無法再大力提高積累。但提高積累是必經之路，因此，要先控制人口生育，才能使消費人口減少，才能增加積累。

9. 人口一多，增長遲滯，科研受阻，糧食緊張。為今之計就是要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要加強避孕，反對人工流產(邵力子贊成流產)：一則殺生，二則傷害女性健康，三則沖淡避孕意義，四則增加醫生負

擔。⁶⁶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自 1980 年代以來重新編輯的馬寅初相關文集、選集和全集，許多馬寅初關於人口問題的文章或講話，雖然全文對於要求控制人口的精神未變，但是若干字句和語氣等已有所修正，已與《人民日報》或其它原刊物的原文不同了。例如在《人民日報》的記錄中，「新人口論」第五段關於積累率的問題上：

我們不能如蘇聯一樣把積累提高到 25%，把消費壓低到 75%，那就等於說我們只願工業化，不願人民了，不免會出亂子。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政府只願工業化，不願人民需要，使人民對於工業化的熱望一變而為對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亂子。

而在《馬寅初全集》裏，關於波匈事件的評價文字便已消失。其中的差別，有二種可能，一是當時的《人民日報》編輯硬加上去的字句，以為事後反擊準備，後人編輯時則把這些字句刪去；二是《人民日報》係將全文刊登，1979 年馬寅初獲得平反之後為免爭議或為尊者諱，而刪除類似具爭議性字句。以當時中共高層政治圈內對馬寅初的關係，包括他在整風時期的態度而言，前一種情況可能性是偏低的，後一種的可能性則相對較高。⁶⁷

⁶⁶ 馬寅初，《新人口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頁 1-42；《馬寅初演講與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36-253。另可參照〈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新人口論」馬寅初的書面發言〉。

⁶⁷ 近人評論也談到類似問題，詳見孫大權，〈《馬寅初全集》補正〉，《社會科學研究》，2004：3（北京），頁 119-125。尤其是頁 124-125，就批評了《馬寅初全集》中隱晦了馬寅初曾贊許馬爾薩斯的部分言論。這些文字差別極為重要，不論是從理解馬寅初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解而言，還是對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時，在「以言論罪」的前提下，判別哪些

〈新人口論〉一文在《人民日報》刊登之後，一開始並未引起特別的討論，更沒有反對意見。7月15日，邵力子的發言記錄也刊在《人民日報》上，同樣也是講人口問題，並表態支持馬寅初的意見。⁶⁸甚至8月份還有宣傳北京市避孕成績的報導。⁶⁹然而隨著中共黨內的知識份子對西方傳統社會科學的敵視，連帶地引發了對人口問題的質疑。8月30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北京舉行座談會，副會長潘梓年首先開砲：

他(潘梓年)指出，右派分子利用中國共產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共產黨整風的機會，發出了「恢復」舊社會學、舊經濟學、舊政治學、舊法學等等叫囂……他們的目的是圖謀資產階級社會學復辟，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反對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潘梓年接著敘述了費孝通、吳景超、陳達、李景漢等右派分子的活動。潘梓年接著指出右派分子企圖使關於人口問題、勞動問題、農業與農民生活問題、城市建設問題、民族問題的調查研究工作都掌握在資產階級社會學者的手裏，其目的很明顯地不是為了學術研究，而是要在科學研究機構、高等學校以至國家生活的各方面奪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⁷⁰

言論可能獲罪而言。一言之差，可能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相反待遇。但由於證據不足，論証只能到此為止。

68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談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並再談有計劃地生育孩子問題。邵力子的發言〉，《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7月15日。

69 〈北京受到避孕宣傳的達八十三萬人次〉，《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8月21日。

70 〈不允許資產階級社會學復辟。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座談會上，潘梓年希望一切愛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起來戰鬥〉，《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8月31日。

在這些批判者看來，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而西方傳統的社會科學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因此，恢復傳統社會科學的主張，是與馬克思主義即無產階級社會科學搶奪思想陣地。⁷¹在此一大方向當中，各種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和主張者都或多或少地被批判，像批判吳景超時，就涉及到人口問題。但是人口問題到目前為止並未從「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範圍裏獨立出來成為獨立的批判項目（梁漱溟的農村建設就獨立出來批判），始終放在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問題框架裏面作為舉例批評。

不過，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李普〈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的文章出現之後，人口問題變成獨立的、並且有政治意涵的主題。此時，人口問題不再只是學術的、意識型態的問題，而是具有批評中共社會主義執政成績的主題：

大家記得，那時候《文匯報》對這個問題很起勁，花了很多篇幅來討論。羅隆基的爪牙劉光華訪問了陳達、李景漢等等所謂人口學家，寫了長篇的訪問記。費孝通在他那篇有名的綱領性的文章——〈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中，也極其惡毒地講了一大段人口問題。從9月18日費孝通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的交代可以看出：他們是有意利用人口問題、節制生育問題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他們不僅要假借這個問題，作為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由頭之一，還要進一步把它作為實現資

⁷¹ 1957年9、10月間，《人民日報》上對於學術問題的批判，許多文章和報導都集中在社會科學問題上，例如9月7日的〈社會主義經濟必須馬列主義指導。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批判陳振漢〉；9月23日的〈斥右派的所謂「建立無產階級社會學」〉；9月8日的〈堅決鬥爭兇惡猖狂的右派分子，農業科學院駁倒陸欽範，把右派論點進行排隊，分工研究，充分準備，一一批駁〉；9月25日的〈是「學術活動」還是政治陰謀？科學家們揭露吳景超的醜惡面目〉等。

本主義復辟的由頭之一。⁷²

李普在中共建政前後是新華社記者，後來曾任新華社副社長，當時是北京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教員。在李普看來，一再宣揚中國人口問題嚴重，意思是中共餵不飽人民，經濟發展不起來。因此，李普的文章是把人口問題獨立化、政治化的重要指標性文章。不過，李普的文章雖然點了吳景超、費孝通、陸欽範的名字，而對馬寅初則以「算帳的還有一位經濟學家，他算的面更寬」稱呼之，並引述馬寅初〈新人口論〉當中的段落批判之。李普還說「右派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章羅聯盟的人不敢公開說出來。可是前述那一位經濟學家的文章，倒無意中透露了一點消息。」已經把這些談人口問題的學者看成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政治控訴意味濃厚。

可是，李普的文章出現之後，接下來的幾個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要報刊上並沒有其他跟進的文章和評論，而批判「章羅同盟」的活動報導仍在繼續。至於人口問題，相反的，《人民日報》在11月1日還報導了農村中透過辯論而多數贊成節育的案例。⁷³11月21日，〈從六億人口出發，進一步解決某些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一文又一再強調中國人口多，底子薄，一切經濟發展要以六億人口為出發，要考慮到中國有六億人口這個事實。⁷⁴這些文章不但承認中國人口眾多的事實和困難，對於節育的問題也抱持著肯定的態度。

⁷² 李普，〈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10月14日。

⁷³ 新華社，〈孩子多既影響生產又影響生活，雙井農業社辯論節育大有收穫〉，《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11月1日。

⁷⁴ 報導農村人口問題辯論文章的作者署名新華社，勞工福利的文章則無署名。此外還需包括孫光，〈必須控制城市人口〉，《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11月27日；《新華社》，〈動員剩餘勞動力支援農村，上海市人代會討論控制人口增長辦法〉，《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1月10日。

這一切都顯示，吳景超、陳達、費孝通等人被打為右派，比起人口問題，更為直接的恐怕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學是否應該設立西方社會科學」的問題，並牽涉到所謂「章羅同盟」的問題上。至於人口問題，1957年一整年，大體上並未成為反右運動的主要批判項目，雖然李普不點名批判馬寅初和人口問題，但是以李普當時的文章表現，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很難說是中共官方組織批判的證據，儘管作者的身分、看問題的角度和措詞極具官方色彩。《人民日報》上再見到批評人口問題的文章，已經是1958年2月的事了。

相反的，從1958年2月到6月間，馬寅初關於人口問題的言論仍不時出現。⁷⁵然而同一時期之內，輿論中討論人口問題的文章也時有所聞，正反意見都有。經濟學家王琢甚至認為「社會主義有自己特殊的人口問題」，他指出，現在在中國，如何解決人口問題，社會上有「左」的意見，他們不承認困難，不重視計劃生育；也有右的意見，他們則認中國人口太多，難以發展，人口不能再多了。兩種態度都不可取，要認識到人多是好處，同時也要看到困難，解決辦法是一面計劃生育，一面發展生產。⁷⁶可是到了6月6日，作者署名「叔仲」的文章卻首次公開點名馬寅初：

右派分子站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說出這些話，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他們的立場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立場。值得奇怪的倒是像馬寅初先生這樣的人，也說出這種附和右派分子的話。他在〈新人口論〉一文中說，「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長得太快，而資金積累似乎太慢」。「資金積累如此之

75 主要是一些報紙訪問，以及轉載馬寅初在全國人大第一屆第五次會議的發言，〈有計劃地生育和文化技術下鄉〉一文。

76 王琢，〈談談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道路〉，《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2月1日。王琢是一名經濟學家，長期關注農業經濟方面的問題。

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根據以上這些說法，可以歸納為兩點：一，中國人口多，積累少，不能工業化，不能發展農業，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二，中國人口多，城市安排不了，安排到農村很危險。馬寅初和某些右派分子以此兩點企圖說明中國人口太多，既很難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就無法解決就業問題。⁷⁷

叔仲認為，「同這種觀點根本相反，馬列主義者歷來都認為中國人多，大有希望」，並把馬寅初的觀點與毛澤東的觀點(指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言「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作為相反的論點對立起來。但是，整篇文章除了宣傳政績之外，還大談計劃生育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的必要與必然；

馬列主義者確認人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社會主義生產的高速度發展是解決人口就業的根本道路。但是，這決不等於對我國人多，增殖率高抱著自流和盲目的態度；相反，社會主義制度，既能夠改變了人口問題的性質，也就完全有可能逐步地掌握人口的增殖。可是我們所主張的計劃生育和「新」、「舊」人口論者的觀點有原則的區別。有計劃地生育人口，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的要求。恩格斯曾經英明地預言道：「如果共產主義社會將來有個時候不得不調節人口的生產，就像它在這以前調節物質的生產一樣，那麼，只有這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實現這一點。」⁷⁸

此外，包括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他雖然未直接批評馬寅初或〈新

⁷⁷ 叔仲，〈我國人口和就業問題〉，《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6月6日。

叔仲似乎是一個筆名，真實作者不詳。

⁷⁸ 叔仲，〈我國人口和就業問題〉。

人口論〉，但是他在文中強調自中共建政以來，由於經濟的發展，現在勞動力不是過多而是不足了。⁷⁹這顯然與大躍進的「大煉鋼」、「公社化運動」等措施造成許多公共工程和集體活動同時進行有關。

(六) 毛澤東的態度

1957年初開始，尤其是在2、3月間召開的中共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許多場合提出要開展節制生育的工作。光是這一年有文字記錄的次數，就有八次。由於這些文字常被人斷章取義，借題發揮，在此有必要依照後人匯整過的資料，引用較長的文字，以明瞭上下文之間的脈絡：⁸⁰

在這裏，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並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2月27日)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

⁷⁹ 薛暮橋，〈社會主義經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發展〉，《人民日報》(北京)，1959年1月7日。薛暮橋是著名經濟學家。

⁸⁰ 這些引文係由下列幾篇文章整理而成：劉德中，〈數量與質量——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再反思〉，《粵海風》，2003：6(廣州)，頁38-40；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網，<http://my.cass.cn/file/200306269636.html>；〈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人口世界」，http://www.popinfo.gov.cn/popinfo/pop_doczcwd.nsf/v_zywj2/0147C60A8FF5D31A48256B2D0025FEE7。但這些文章的引文，有些雖然註明了原始出處，但是在現有的各種毛澤東相關文件選集當中卻看不到。可以找到原始出處並有正式出版的文件，筆者已加註。

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我今天不著重談節育問題，因為我們邵力子先生是個專門的名家，他是大學專科畢業的，比我高明。還有我們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2月27日)

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現在我國人口每年增長一千多萬。你要他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在這方面，人類還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政府應該設立一個部門或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地研究這個問題，是可以想出辦法來的。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今天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日)⁸¹

81 《毛澤東思想萬歲》(出版項不詳，1969)，頁95，97-98。

剛剛革命，剛剛搞社會主義，這個生活怎麼會好起來？糧食怎麼會多起來？糧食多了沒有呢？是多了。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們只有二千二百億斤糧食，去年我們就有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億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們這個國家的好處就是人多，缺點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增加這一千四百億斤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1949年缺少糧食，現在還是不夠。要過好生活，現在我們搞出十二年的生產計畫、科學計畫、農業計畫、工業計畫，一步一步來生產、工作。我們年紀大一點的人，這個問題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們一到世界上樣樣要像個樣子。因此，要向他們進行教育，要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教育，特別是對青年進行教育，要進行艱苦奮鬥，白手起家的教育。

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20日)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麼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⁸²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957年10月9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

⁸² 本引文與下一段引文皆出自同一次講話中，但是《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10冊只有講話提綱，與引文的文字有所出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0冊，頁253。

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十年不搞，將來又增加到八億。來個十年計畫，三年宣傳試點，再有三年推廣，過去六年了，還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廣。看可不可能？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畫生育。計畫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麼樣生孩子，怎麼樣養孩子，怎麼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生就不要生。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畫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957年10月9日)

計畫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13日)

上述引文的時間跨度，橫越了整風與反右的期間，由此可知，不論是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之前還是之後，不論是反右運動開始之前還是之後，不論馬寅初〈新人口論〉被批判之前還是之後，毛澤東顯然一貫地主張計畫生育，並沒有因為政治局勢的變動而有所改變。另外，關於人口與糧食的關係，毛澤東也一再觸及，儼然與〈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所強調的「用發展生產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說法相關。

關鍵的問題在於 1958 年大躍進開始發動之後，毛澤東是否一改初衷，強調「人多好辦事」，不再贊成計畫生育了呢？下面引述四段毛澤東在 1958 年的談話和文件以作分析：

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你現在要人家節育，但我們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類還不能掌握這個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幾億人口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邵(力子)先生那個道理就會大興。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日，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人口之時。你現在講，他橫直不聽。但是我並不是說不要做宣傳，不要製造工具。要做宣傳，要盡可能做宣傳。我是贊成節育的，並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樣能控制。現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要看到嚴重性，同時也不要那麼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走到極點就會走向反面。現在我看還沒有達到極點。中國地大物博，還有那麼一點田。人多沒有飯吃怎麼辦？少吃一點。要節省。一方面講節育，一方面要節省，要成為風氣。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⁸³

(一)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這裏有十四項：1·工業，2·手工業，3·農業，4·農村副業，5·林業，6·漁業，7·畜牧業，8·交通運輸業，9·商業，10.財政和金融，11·勞動、工資和人口，12·科學，13文教，14·衛生。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畝五分地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少，很難叫農民節育。少數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區可不節育，其他地方可試辦節育。一要樂觀，不要悲觀；

⁸³ 《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56。引文與原文有所出入。

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

在成都會議上陶魯筋領發言時的插話(1958年3月23日)

《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這篇文章值得一讀……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

《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選集》⁸⁴

上述資料顯示，毛澤東在1958年大躍進開始之時，對於節制生育的問題仍未鬆口，人口問題還明確寫入「工作方法六十條」的草案之中。可是他也提出了在農民中間宣傳節育問題的困難。這是否因為1957年間若干計劃生育的工作進展受到阻礙，導致他有感而發，或者背後還有其它問題，則不得而知。其次，鑑於大躍進的目的就是透過改變生產關係以提高生產力，因此，在當時錯估情勢、認為在生產力前進可期的情形下，對於人口眾多這個事實毛澤東表現出很有把握解決的態度。

往往有些人單獨把「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這幾句話單獨引出，企圖論證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已經把他自己在1957年所強調的節育工作和計劃生育的想法拋諸腦後，「頭腦發熱了」，實有斷章取義之嫌。⁸⁵如果我們細讀上述文字，很清楚地可以看到，

⁸⁴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紅旗》，1958：1(北京)，頁2。

⁸⁵ 如劉曉波，〈中共毛澤東如何戕害國人的生命〉，「大紀元網」，<http://www.epochtimes.com.au/gb/4/8/17/n630239.htm>。

毛澤東在談到這些人多的話時，有的只是中國人口眾多的既存事實表述(如「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有的只是鼓勵、振奮人心的用詞(如「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經過斷章取義之後，前後文中強調要節育的文字都不見了。一般讀者若未經深入了解，極易形成一偏之見。

(七) 1958-1960 年間北京大學內外的氛圍

儘管毛澤東在 1958 年之後有上述這些表達關於控制人口的意見，但是批判馬寅初的聲浪卻不減反增。《經濟研究》雜誌、《光明日報》、《新建設》雜誌等，自從 1958 年 2 月起，批判馬寅初的文章突然出現、增加了起來。

論起這一波批判馬寅初的浪潮，必須注意到當時的時空背景。當時的北京大學，雖然在反右運動時抓出了一些右派，但是北京市黨委認為北大的右派人數比例不夠，表示反右不力，1957 年 11 月甚至因此還撤換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改以陸平代之。自此之後，北大又多打出了一些右派。⁸⁶因此當時的北大校園中風聲鶴唳，政治氣氛緊縮。

緊接而來的，是 1958 年 3 月開始的「雙反運動」，以及「興無滅資」、「插紅旗、拔白旗」等思想批判。雙反運動原本的出發點是為了反對「浪費保守」和「五氣」而發。所謂的五氣，是指官氣、暮氣、驕氣、嬌氣、闊氣，這些都是指北大校務行政人員和黨政幹部身上的工作作風而言，並非思想批判，而且被批評的對象也是上述人等。可是越到後來，北大師生所張貼的大字報內容，越發地走向了思想批判，主要的問題即「紅專」問題，批判的對象也轉向為一般師生。⁸⁷在

⁸⁶ 丁抒，《陽謀》，頁 202。

⁸⁷ 本報訊，〈黨員帶頭引火焚身推進運動，北大黨委召開黨員哲師大會〉，

北京大學的校園內，受到「插紅旗、拔白旗」、「興無滅資」等政治風潮的影響下，關於馬寅初的問題，北京大學校黨委於 1958 年 4 月 19 日便已有了結論。在他們向北京市委的報告中，就提出了兩點意見：

1. 對馬寅初的右派言論，可以在小型談心會上給予批評；
2. 對馬寅初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也可以小會批判，目前不宜開大規模批判會。⁸⁸

馬寅初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跟許多黨政幹部一樣，在此期間自己貼了自己的大字報作自我批評，主要針對兩點，一是自己到任北大校長七年以來有些工作沒有做好，身上存有官氣和暮氣，二是檢討 1957 年 4 月間在北大關於人口問題的公開演講當中有一些錯誤的用語和說詞(主要指「如人口這樣增長下去，五十年後，中國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難而侵略他國」這一句話)。當時因為會後有人向他提意見，包括北大經濟系教授樊弘，他認為這個意見很好，因此接受批評，提出感謝。這兩張大字報貼出之後，《北京大學校刊》便予以轉載。⁸⁹

至於興無滅資、插紅旗、拔白旗等思想批判運動，則必須拉長時間來看。自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和中共主要領導人就一直思考著如何讓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能深入人心，尤其是知識分子。如果中共統治下的知識份子能夠接受、並且認同馬克思主義，積極研究並將其與具體的問題做連繫，對於中共政權的穩固，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優位性，將有重大的效果。因此，如何將現有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想法，與

《人民日報》(北京)，1958 年 3 月 22 日。

⁸⁸ 彭華，《馬寅初最後的 33 年》，頁 168。

⁸⁹ 鄧加榮，《馬寅初傳》，頁 263。馬寅初所說的演講內容，即〈關於人口問題和科學研究問題〉。然而根據彭華的看法，《北京大學校刊》轉載馬寅初自我批評的大字報，是出於馬寅初本身的主動要求，詳見彭華，《馬寅初的最後 33 年》，頁 166。

馬克思主義做連結，始終是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念念不忘的事。1958-1960 年在大躍進的政治高潮中，長期以來為人關注的多半是關於中共在生產力的躍進舉措，卻較少專門從生產關係的變革來看，而生產關係的變革是中共當年最爲在意的事情之一。中共建政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此前 1956 年間的工商業改造，以及 1955-1958 年期間的農業合作社從初級社一路走向人民公社，都是生產關係變革的一部分，但這些都只是政治和經濟部門的措施。至於在意識型態領域，則要把前述的各種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運動納入。對於中共尤其是毛澤東而言，唯有如此，中國才能全面的社會主義化，而沒有意識型態上面的改造，光有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造，不但是不足的，而且會有復辟的危險。從這個角度來看，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1953 年批判俞平伯事件、1955 年批判胡風事件，以 1950 年代後期至 1960 年代初期一系列對於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言論所進行的批判，包括「紅專問題」的辯論、「興無滅資」、「插紅旗拔白旗」、批判「武訓傳」、「三家村」等，實出於此一考慮的結果。這些問題在毛澤東看來，都是屬於文化革命的範圍，以有別於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且，唯有進行文化層面的革命，所謂的「封建殘餘」、「資產階級殘餘」，才能逐步肅清。「興無滅資」運動在當時似乎是一個不甚起眼的事，並未如「肅反」或「三反五反」一般地在社會上大張旗鼓發動，但是對於學術界或其它專業領域當中，卻影響深遠。以北京大學的情況來看，首任北大學校長馬寅初，一直當到 1960 年，校長的位置則由校黨委書記陸平接任，批判馬寅初與這次人事變動有直接的關係。前面所述 1959 年康生說「他(馬寅初)的校長是不能做了」這句話，便是最好的明證。

在北京大學校黨委的指揮之下，1958 年上半年組成了「人口理論研究會」，是由北京大學經濟系爲主的師生十多人所組成。該研究會

的組成，教授兩人(樊弘、陳岱孫)，副教授一人(趙靖)，講師兩人(韓佳辰、周家本)，助理一人(諸葛殷同)。小組成立時，馬寅初也受邀到會，但是他們把馬寅初作為對立面，並在日後出版專書批判馬寅初。⁹⁰而此一小組成員的研究成果和批判文章，也就成為了 1958 年初以來新一波批判馬寅初的主要彈藥來源，許多報刊和專書批評馬寅初的內容，便是轉載或出版他們的文章而成。

1958 年 7 月，羅志如(北大經濟系教授)、樊弘、韓佳辰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了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主要是根據馬寅初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當中提出來的若干論點。⁹¹在這本書中，馬寅初已不再純就人口問題討論，而就如書名，提出了他自己的經濟理論(綜合平衡論)和哲學思想(團團轉理論)，並對自己的政治立場提出辯護。同年 10 月，《北京大學學報》還特地出了一本「人文科學科研大躍進」專刊，其中的〈編者言〉顯示出當時北大校園的氣氛：

黨於領導反右派鬥爭，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獲得偉大勝利之後，接著又領導了轟轟烈烈的雙反整改、紅專辯論和教育方針的辯論。在這一系列的巨大勝利的基礎上，適應黨的社會主義總路線頒布後全國大躍進形式的迅速發展，黨委於八月一日又發動了向科學大進軍的戰鬥號召。……在躍進的過程中，全校師生在黨委的密切關懷領導下，政治掛帥、破除迷信，本多快好省精神，樹立敢說敢想敢幹的共產主義風格，拔白旗、樹紅旗，堅決向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向一切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偽傳統開火。……自八月初到國慶節前夕，經過兩個月的苦

⁹⁰ 彭華，《馬寅初最後的 33 年》，頁 168。

⁹¹ 其中樊弘的文章付印之後，「因故暫停發表」，編輯部還夾了一張小紙條說明，故本期的《北京大學學報》127 至 132 頁是被抽掉的，只有目錄上的篇名。

戰，全共完成科研項 4100 餘個……經過這次大躍進，一切對科學的神秘觀念被破除了，自卑感被砍掉了，資產階級為學術而學術的虛偽性和反動性已充分暴露。……共產主義的北京大學，將根據躍進規劃加速地建立起來。⁹²

這個增刊的內容主要就是在講述這兩個多月以來的各種作為。例如許多課程提出了新的教學規劃，許多科系的師生走出學校進行田野調查等。但是，哲學系批判馮友蘭、經濟系批判馬寅初，也作為成績列入其中，其它如東語系、圖書館系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如何批評馬寅初？對當時這些批判馬寅初的師生而言，也有過不同的考慮：

曾有人認為，我們不懂馬夏爾、⁹³馬爾薩斯「理論」，就不能透徹地批判馬寅初，所以主張先學習馬夏爾的理論，再批判馬寅初。也有人認為批判馬寅初先生是學術批判，因而批判時只能按馬寅初提出的問題，一個一個地去反駁，去論證。……對以上觀點，小組內展開了辯論。大家一致認為能否透徹批判馬寅初先生的學術思想，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懂不懂馬夏爾理論，關鍵問題是我們馬列主義學習的高低，因此必須加強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而不是首先學習馬夏爾的「理論」。在批判時要抓住馬寅初先生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本質，從本質上加以揭露和批駁，這樣才不致跟著馬寅初先生「團團轉」，而與他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⁹⁴

姑不論此一批判事件當中雙方的是非對錯，光是藉此讓這些參與

92 〈編者言〉，《北京大學學報》，1958：4(北京)，頁 2。

93 即德國經濟學家 Alfred Marshall，中文一般譯為馬歇爾。

94 〈政治掛帥、發動群眾，大搞科學研究的經濟系〉，《北京大學學報》，1958：4(北京)，頁 8-9。

其中的師生能多花時間閱讀馬列著作，就中共而言，就算是有所收獲了。儘管之前校黨委對馬寅初的批判一事傾向「不宜開大規模批判會」，此一小組最初似乎也是按此一規格辦理，只是把馬寅初請到研究會中進行批判，也引來了馬寅初貼出自我批評式的大字報的善意回應，但不知如何，北京大學校園中批判馬寅初的言論，最後仍是越出了小型批判的範圍，出現在大字報當中，其中甚至於還有小組成員署名的文章。如此一來，批判馬寅初的聲浪便擴大了。

不只在北大校園內，整個知識界都開始出現批判馬寅初的聲浪。1958年2月，戴園農和王琢合寫了一篇名為〈「新人口論」批判〉的文章，刊登在《經濟研究》上，隨即引起了《光明日報》的轉載，進而展開了大量的批判。這篇文章開宗明義便把自己的觀點和他們所認為的對手「新人口論者」的觀點對立起來：「新人口論者同我們辯論的根本問題是：在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薄弱的我國，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人口問題的政治性被更加強調了。在說明了中國當時的經濟條件之後，兩位作者指出：

新人口論者論斷我們在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薄弱的我國，依靠國內的資金積累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新人口論者認為人口同資金積累是對立的，我國當前的一個重要矛盾是「人口多、資金少」。費孝通說：「如果所剩餘的為數很少，不能積累起來發展重工業，那就很難想像這個社會能進入社會主義了。」……顯然，這種把人口同資金積累相對立的論點是反動的。國民收入本來就是人創造出來的。……我國的國民收入固然有一大部分為六億人口所消費，但也正因為有六億人口才創造出這麼多的國民收入。至於從積累水平來說，那末，一個社會的積累水平，是被這個社會已經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和一定的消費水平決定的。而這種生產力的本身又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和先前各代人們已經取得的

生產力，這就是說，在一定的生產力和消費水平下，有了這麼多的人才創造出這樣多的積累。⁹⁵

這篇文章雖然沒有點名馬寅初，而是以費孝通為對象，但是「新人口論」一詞是馬寅初說的，「人口多，資金少是一個重要的矛盾」也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一文當中的破題之詞。

《光明日報》一直以來主要的讀者對象便是知識份子。其實早於1957年底與1958年初，《光明日報》就已出現若干贊成計劃生育和批判馬爾薩斯理論的文章，即便到了3、4月間，此一趨勢也沒有太大的變化。⁹⁶然而1958年4月19日起，《光明日報》開始不定期轉載北京大學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之後，情勢開始有了變化。⁹⁷根據當時總編輯穆欣的說法，他認為《光明日報》當年雖對馬寅初進行了錯誤的批判，但是基本上他們仍然堅守了讓雙方都有說話的空間，而非一味地批評。⁹⁸從當時的報紙內容來看，也的確是如此，《光明日報》當時一部分以轉載北京大學大字報的方式呈現馬寅初的人口問題，正反意見雖然都有，但是批評遠多於支持。另一部分則是專人的專題文章，則一面倒地批評馬寅初。不過，馬寅初自己寫的回應文章也全文照登。

這裏還必須指出一個背景事件。1958年5月5日到23日，緊接

⁹⁵ 戴園晨、王琢，〈「新人口論」批判〉，《經濟研究》（光碟版），4（北京，1958）。

⁹⁶ 如趙靖，〈批判馬爾薩斯主義和宣傳節育〉，《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12月27日，第3版；王辛南、謝志成、王靜，〈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生〉，1958年3月8日，第3版；本報評論員，〈計劃生育好處多〉，1958年4月1日，第2版等。

⁹⁷ 如周家本、強重華，〈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光明日報》（北京），1958年4月19日，第3版；鄭亞英，〈再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1958年4月26日，第3版等。

⁹⁸ 穆欣，《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頁104。

著中共八屆四中全會，中共又召開了八大二次會議，修正了原本對於中國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說法，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劉少奇在大會上作口頭〈工作報告〉。在這次報告中，是中共公開正式文件中首次對於人口問題的各種觀點提出評價。劉少奇說：

有人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得多，積累就不能多……他們只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顯然，這是一種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⁹⁹

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稍後，叔仲的文章便出現在《人民日報》(6月6日)。這些言行在時間點的先後次序上極為巧合，以致有人直指劉少奇的報告是不點名批判馬寅初。¹⁰⁰從而，政治風向的訊號響起，批判馬寅初的聲浪也就日益升高。

因此，如果從 1955 年開始起算，中間除了李普的文章將人口問題獨立化之外，1958 年 4 月至 1959 年 4 月間，是第二波對馬寅初的大規模批判，而批判面之深、之廣、之久是歷次批判之最。但是這次批判馬寅初的主要戰場，並不是在《人民日報》，而是《光明日報》、《新建設》雜誌和《經濟研究》雜誌等。1958 年 6 月到一直到 1959 年 4 月，《人民日報》批評馬寅初的文章都只是個人署名的文章，並且間隔甚長，自 1958 年 6 月至 1959 年 4 月間，也只有叔仲一文真正點名馬寅初，另有三個活動消息，報導北京大學、北京人民大學、華

⁹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 11 冊，頁 309。

¹⁰⁰ 《光明日報》的部分，詳見鄧加榮，〈馬寅初和《光明日報》的恩恩怨怨〉；北京大學批判馬寅初的歷程，詳見彭華，《馬寅初的最後 33 年》，頁 166-175。彭華即認為劉少奇不點名批判馬寅初。

東師範學院三所學校批判馬寅初的相關活動。其他文章的批評矛頭則是以「新馬爾薩斯主義」或「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名之，卻不點任何人的名字。1959年4月27日，馬寅初在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改選時，仍舊獲選為人大常務委員。很顯然，儘管遭到了眾多的批評，中共的介入批判也甚為明顯，但是馬寅初的政治地位仍未受損。

1959年4月以後，批判馬寅初的聲浪幾乎停止，巧合的是，同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18日至28日，第二屆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劉少奇被選為中共國家主席。自此以後，一直要到1959年底及1960年初，批判馬寅初的第三次浪潮，也就是康生介入、並導致馬寅初辭去北京大學校長的事件，才又開始。

1960年4月，《人民日報》刊載了國務院人事公告：免去馬寅初北京大學校長的職位，由原副校長兼北大黨委書記陸平接任。馬寅初時年79歲。¹⁰¹

四、結論

馬寅初及其人口問題，起初只是開端於1955年一般的人大省級小組會議，在其意見被壓制後，雙百方針與整風運動的推行才使人口問題廣為討論，馬寅初並不是公開宣傳的第一人。反右運動中馬寅初雖然因北大校長身分而受到他人對於領導工作問題的批評，但並未受到政治打擊，甚至主動向批評中共的人士喊話「雙方都要拆牆」。因此，馬寅初在反右運動中未遭到政治批判，也未被打成右派。傳統對於「馬寅初在反右運動時因〈新人口論〉遭到政治批判」的既定歷史

¹⁰¹ 新華社，〈國務院任免名單〉，《人民日報》（北京），1960年4月17日，第1版。

解釋，既有誤解的成分，也有擴大解釋的成分。

其次，北京市人口學會在編寫《人口學百年》時，道出了他們對於馬寅初事件的觀察：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 1957 至 1960 年對馬寅初的批判就可發現，當時主要批判馬寅初兩個理論，一個是經濟上的「團團轉理論」，另一個就是〈新人口論〉。馬寅初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經濟學，「團團轉」其實是他的主要經濟理論。雖然對「團團轉」的批判聲勢大於對〈新人口論〉的批判，但這些批判最多也就是把「團團轉理論」斥責為「不是唯物辯證法」，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嚴重歪曲了計劃經濟內容」等，並未涉及到立場是否「反動」和對人民群眾是否「仇視」。而批判〈新人口論〉的文章卻通篇充滿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鬥爭」、「反動」、「帝國主義分子」、「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等一大堆政治詞彙。¹⁰²

不過，至少就《人民日報》的言論範圍而言，馬寅初在人口問題所受到的批判考語，最嚴重者，不過是李普、叔仲所言：「算帳的面太寬」和「附和右派」，畢竟與右派有所不同；而「團團轉理論」首先以〈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之名刊登於 1956 年 12 月 28、29 日和 1957 年 5 月 11 日的《人民日報》上，但《人民日報》本身卻只有在 1958 年報導過《計劃經濟》雜誌有人對此理論提出不同看法，並無對此文章進行上綱上線式的批評。¹⁰³加上李普、叔仲等人的批評，與反右運動時對待陳達、吳景超等人的方式，輕重之間，不可同日而語。比起北京大學師生貼出的大字報言論，以及其它報章雜誌而

¹⁰² 查瑞傳，《人口學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158。

¹⁰³ 馬寅初，〈綜合平衡理論的討論〉，《人民日報》（北京），1958 年 4 月 17 日。

言，《人民日報》對馬寅初，算是非常客氣的。

作為中共官方黨報，《人民日報》對於人事的處理和評價，具有相當重要的代表性，這在其他右派分子在《人民日報》上的考語便可看出。可是透過對《人民日報》的分析顯示，在反右運動時期，馬寅初並未在政治上被定罪，中共中央的公開文件中，除了劉少奇「可能」不點名批判之外，也從未有任何指稱馬寅初為右派的文件。即使未來中共公佈更多內部文件，能夠證實當時中共高層的確有意、甚至真的把馬寅初劃為「內控右派」，也跟反右運動無直接關係，更為可能的是與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後中共內部各種情勢的變化有關。筆者試著提出以下幾個部分：

首先是大躍進的決策。不論是中共高層領導人，或者是像馬寅初一般的民主人士或黨外知識份子，在 1950 年代，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都有著高速前進的期待。從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一文可知，他之所以講到人口問題，也是在「如何提高經濟積累，以加速工業化」的思考方向下進行的：減少人口，可以減少消費(節流)。至於增加生產(開源)的辦法，工業加速機械化與農業高速集體化都是大躍進中的重點。這些不同的偏重點，在上引諸多論戰文章當中顯示，被批評馬寅初的一方視為「沒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

其次是中共在意識型態領域上的爭奪。就如上文指出的，如何將現有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想法，與馬克思主義做連結，始終是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念念不忘的事。如果他們不能被改造成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中共便極有可能將他們從各級領導崗位上拉下來。1960 年陸平取代馬寅初成為北京大學校長，是中共黨員擔任北大校長的首例。

最後，則是中共高層人事派系的鬥爭。周恩來與眾多民主人士交好，馬寅初與周恩來更是 1940 年代在重慶時期便已熟識。周恩來在

中共黨內一直是「條條」的共主(指國務院各部會)，與劉少奇所直屬的「塊塊」(各省市黨委)各都自成系統，而北京大學黨委直屬北京市黨委——即彭真——管轄，彭真與劉少奇的關係匪淺又是人盡皆知。當時的毛澤東，大體上是支持劉少奇派，或甚至跟劉少奇是同一派系，直到文革前幾年，毛、劉才逐步分裂。因此，儘管若是真如彭華所言，劉少奇不點名批判馬寅初，那麼以馬寅初的地位和毛澤東的權力位置，毛澤東也不可能不知情。但是以目前的資料看來，毛澤東並未像批判梁漱溟、俞平伯等人一樣站在第一線，或是直接表態。如果純就人口問題和 1950 年代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情勢的觀點來看，馬寅初和毛澤東在觀點上並無明顯的對立。馬氏在人口問題上強調要控制人口，毛氏也是，但認為在執行上有一定的困難，而且人口多的問題應可透過發展生產來解決；馬氏認為在經濟發展上要綜合平衡，毛氏也一再強調要「兩條腿走路」，並無衝突。

至於目前中國大陸充斥著「毛澤東與馬寅初對立因而遭到批判」的說法，筆者認為是在下面兩個情況下造成的：

一、把毛澤東的觀點和馬寅初的觀點對立起來，最早源自 1958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報》署名叔仲的文章。這種做法幾乎是中共早年批判文章寫作的標準做法：要證明此人說法為錯誤，常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強調此人與中央領導人的觀點是對立的。然而叔仲的做法是斷章取義，上文已有述及。

二、1982 年，馬寅初去世，享年 101 歲，臨終前被譽為「計劃生育第一人」，並且成為中國人口學會榮譽會長。而自他被平反至去世期間，正是中共形成「一胎化政策」的重要階段。1978 年，中共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指導思想，使之提高到中共國策的高度，同時在理論上提出了「兩種生產一起抓」的思想。1979 年，中共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提出「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

一個孩子」，並用立法形式將實行計劃生育固定下來。1980年，中共的新《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還規定最低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22周歲，女不得早於20周歲，以晚婚延長代間期。¹⁰⁴平反馬寅初，似乎是為了新時期的人口政策作輿論準備，並且按照中共的慣例，一定要把批判馬寅初與過往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連結一氣，以示新時期的作為與舊時期不同。此舉或許有中共內部政治上的若干考量，但與歷史實況不符。

因此，馬寅初事件，不論就性質和時間而言，顯然必須與反右運動脫鉤，重新理解。

(本文於2008年1月25日通過刊登)

¹⁰⁴ 沈益民、童乘珠，〈中國人口問題——計劃生育與人口遷移政策〉，《人口研究通訊》，總第21期(北京，1998)，頁16。「兩種生產」指的是自然生產(人口生殖)與社會生產(經濟生產)。

Rethinking the Ma Yin-chu Incident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Wen-Lu Hsu

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Fu-Jen University

I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Ma Yin-chu Incident is often treated as a key example in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Rectification to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of 1956-58. However, it is clear from China's ma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f that time, recent published memoirs, and related research that the Ma Yin-chu Incident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must be distinguished. This article reconsider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a Yin-chu incid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words: Ma Yin-chu, Anti-Rightist Campaign, new demography, birth control